
温州经济史上的人口变迁及其影响^{*1}

蔡建娜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0020)

【内容摘要】:通过对温州历史上人口变迁与经济发展方式相互作用的考察, 该文认为南宋时温州适度的人口压力推动了基于市场与分工交互式发展的“斯密式”增长, 温州历史延续了这种“斯密式”增长动力, 并通过民间的社会结构、区域性文化意识形态等保存下来, 这是中国文化内生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发展模式。

【关键词】:温州经济史 人口变迁 “斯密式”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7)06-0119-010

一、温州历史上的人口变迁

1. 温州经济史的跨时期人口数据

温州古名“东瓯”^②。《史记》卷 22 记载:汉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 闽越王率兵进犯东瓯, 汉廷出兵制止, 随后“东瓯王请举国徙中国”, “其地遂虚”。历史上和现在的温州人主要是由遗留下来的古东瓯国的越族人, 在历史上不断融合外来移民而成, 后世因避乱与谋生陆续迁入温州的北方移民与邻近的福建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温州人口的主体^③。

温州历史上人口增长的情况可初步通过历代温州户数的增长情况来推断(参见图 1)。本研究中作为重要研究基础的跨历史人口数据采纳了陈丽霞(2005)在《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进行一番考订得出的户数统计数据, 结合相关学者对明代中后期户数统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些修正。

¹ 收稿日期:2017-01-12

作者简介:蔡建娜(1977-), 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20), 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温州经济与温州模式。

² ①海东之国曰温州, 在汉时曰“东瓯”。孝惠三年, 立摇为东海王, 都东瓯, 即其地也。瓯, 水名, 出永宁山, 去郡城五里入江, 是为瓯江。东越既徙中国, 其地遂虚。后并闽越同属会稽郡, 是为回浦。又分治县曰“东瓯”者, 《寰宇记》郁林为西瓯, 是以别也。东汉为章安, 晋明帝太宁元年立永嘉郡。隋初, 废郡为永嘉县。唐上元初置温州, 以其地燠暖少寒, 故名。参见:清郭钟岳《瓯江小记》), 转引自:陈瑞赞编注, 《温州文献丛书·东瓯逸事汇录》, 第 3 页。

³ ②据统计, 温州历代以来取得殿试资格者, 祖籍南方福建者占据六成, 而祖籍北方者则占三成, 而真正祖籍本地者, 反而不足一成。参见, 陈丽霞, 《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 浙江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52 页。

单位：万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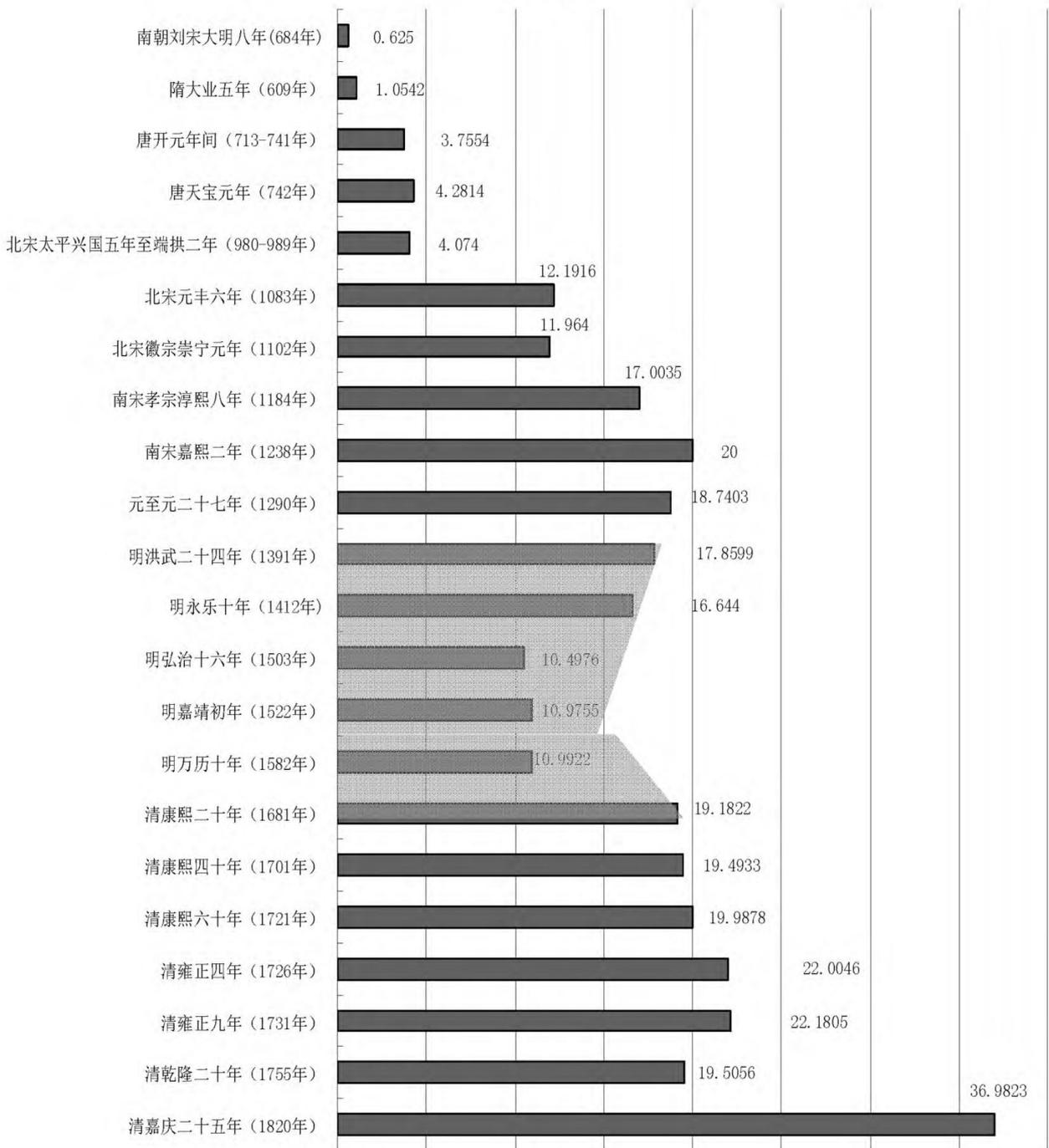


图 1 历代温州户数增长

数据来源：陈丽霞，《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浙江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23 页。

相关数据说明：

(1) 关于户数统计。前近代的人口统计非常粗糙，往往不是没有明确的数据就是残缺不全或相互抵牾，使人口增长的计算

十分困难。遗存下来的主要是行政资料，主要是官方出于税赋目的所作的户口统计，距离真实情况有相当距离。但是，利用历史上的户数统计作为探求人口动态变化的相对资料，仍然有一定意义。历史上的户数记载要比人丁统计准确，故以官方统计的户数为基准。

(2) 此处所引用的温州户数增长数据，是由陈丽霞(2005)进行一番考订得出的数据。其中，对于明朝中后期的户数统计，由于人口史上普遍认为：当时的人口登记比较混乱，隐口问题比较严重，数据明显偏低。因此，笔者结合此间温州相关移民情况记载，对数据做了非常粗略的修正，由灰色框域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如图所示，温州户数增长自达到峰值后，元、明时期出现一定程度回落，尤其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较严重的负增长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于沿海倭患和明朝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使得温州社会经济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使得人口与户数出现较严重的负增长局面。

但在一定程度上，官方统计应该对事实有所夸大，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明代中后期的人口登记比较混乱，隐口问题比较严重，数据明显偏低。根据史载，明末清初福建移民(主要来自闽南)向温州的移民持续了几百年。由于福建移民的进入，明末温州实际人口和户数应该远大于官方统计数字。我们可以根据倭患和“海禁”政策延续的时间，结合尤其是从嘉靖晚期开始大规模福建移民移入的情况，对温州的户数做粗略的修正(实际户数变动在图示的灰色区域内变动)。

2. 温州经济史上人口变迁的三个阶段

从温州人口历史数据结合相关经济史资料进行观察，笔者认为：温州经济史(至清末)，根据人口增长情况可以分为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地关系宽松，宋之前人口持续增长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人地关系相对平衡的宋时至清初，或者说人口的“马尔萨斯制约”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人口剧增并形成“人口危机”的中晚清时期。

具体来说：直至唐宋之前，温州还是地广人稀、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属于不闻于世的偏狭之地。东晋、南朝期间北方战乱，北方士族大规模举族南迁，一部分涌入温州，促成了温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开发^④。然而，南朝时只有靠近山脚的小块平原获得开发，人口稀少，刘宋大明八年，永嘉郡只有 6250 户，三四万人口，但手工业比较发达，如陶瓷业和养蚕丝织业。

唐代温州得到较大发展，公元 742 年(唐天宝元年)已有 4.28 万余户，24 万余人口，比东晋南朝增加了六七倍；农业进一步得到开发，手工业部门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工艺水平提高。北宋时期温州经济又有所发展，人口较前有了大幅度增长，从 980 年-1083 年(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北宋元丰六年)的近百年中其户数从 4074 户增长到了 121916 户，增长近三倍；经济发展以造船业、造纸业、陶瓷等手工业部门为突出，所产鬲纸、漆器闻名于世，销路颇广。^⑤ 两宋之际，在金兵追击下，宋室南渡，高宗一度驻蹕温州，大批百官家属与流民跟随东迁。“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迁入温州的人口也骤然增加。据史载，北宋末年徽宗崇宁年间，温州的人口数是：119640 户，462710 口；而至南宋中期孝宗淳熙年间，则增加至 170035 户，910657 口。七、八十年间，人口增加了 50395 户，447947 口。至南宋末期，温州人口已至近百万。

宋时温州的垦田面积大大超过前代，围海造田成为垦殖拓展的主要方式，山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到了南宋后期，除了腹地山区尚未完全开发之外，“东瓯之俗，率趋渔盐，少事农作，今则海滨广斥其耕，泽泽无不耕之地”^⑥。由此可见，及至

⁴ ① 平阳前志称：“五季朱褒、卢约迭据永嘉，朝夕反覆，卒归钱氏。平阳又与闽接壤，闽越交争，属当战地，锋镝所及，流移必多。故吾平民间族谱多言唐季避王曦乱，自赤岸来徙。赤岸者，古长溪地，今福鼎县也。”原文出处：民国《平阳县志》卷十九《风土志一·民族》。转引自：林顺道，《摩尼教传入温州考》，《世界宗教研究》，2007 年第 1 期。

⁵ ② 内容可参见：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 2005 年大学博士论文，第 5-6 页。

⁶ ③ 参见：吴泳：《鹤林集卷十六》，《知温州谢表》。转引自：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11 页。

南宋，温州的人口增长已经开始遭遇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历来相对宽松的人地关系开始走向紧张，也即出现了狭义上的“马尔萨斯制约”。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南宋时期的温州逐渐成为一个缺粮地区，只要是小的灾害，温州就缺米。“臣试郡永嘉……去岁晚禾未登，偶缺秋雨，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⑦”，即使是在平常的年景也需要从外地进口粮食^⑧。其时，溺婴和火葬的流行，以及“漏泽园”^⑨的建立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紧张^⑩。南宋时期朝廷大力推行和提倡的义仓法在温州并没有实施，一直到元明时期温州才出现义仓之类的民间救济组织，这也从侧面也反映了南宋地区温州人口过多，粮食缺乏，一些社会保障措施无法实施^⑪。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农业技术框架下南宋时期的温州，已将从粮食生产衡量的地区人口承载能力扩展到了某种极限。事实上，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温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有观点称“南宋时期温州粮食亩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一倍”，而根据陈傅良在一篇劝农文中所称“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⑫。这主要得益于南宋时期温州地区农耕技术的改进和水利设施的大量修建^⑬。北宋时期，温州共兴修水利计多处，但总体上而言这个时期土地资源约束尚未十分突出，所以对土地、水利的综合治理需要并不强烈。到了南宋时期，温州地区兴修水利达 300 多处，大部分是在高宗和孝宗时修建；此外 1166 年大水灾后，温州又掀起一股兴修水利高潮，当时的温州太守“召县之能者总其事，召乡之士有才干者董其役，如朱侠棣，瑞安塘，路石冈斗门，工役浩繁，皆不日而成。”南宋时期兴修的水利设施如此之多之完备，以至于此后的历朝历代基本上只在此基础上进行维护、不再新建。

可见，直到北宋时期温州地区还没有显现出土地资源对人口发展的约束，及至南宋，宋室南迁、北民拥入致使温州的人口开始突破 17 万户的规模，历来相对宽松的人地关系开始走向紧张。从粮食生产来看，南宋时期的温州基本上已经把区域的土地承载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由于农业技术改进与积累的缓慢性，在缺乏现代社会大规模的跨地区粮食贸易的条件下，这一事实对温州的人口增长形成了刚性制约。这就是温州历史上人地关系相对平衡的宋时至清初，在将近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温州历史上的人口数量基本上在一个区间内徘徊，人地关系处在一个相对的平衡区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南宋初始温州历史上确实出现了“马尔萨斯制约”，无论出于消极还是积极的抑制机制，人口增长确实受到了抑制。

⁷ ①楼钥：《攻媿集》卷二十一，《论流民》。转引自：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29-30 页。

⁸ ②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3 页。转引自：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29-30 页。

⁹ ③宋代的医疗慈善机构，用来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元丰间(1078~1085)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宁三年(1104)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宋史·食货志》载：“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瘞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积极意义。

¹⁰ ④楼钥：《攻媿集》卷九十七，《集英殿修撰致仕赠光禄大夫曾公神道碑》。转引自：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10 期。

¹¹ ⑤分别见民国《平阳志》，光绪《乐清志》，光绪《永嘉县志》，乾隆《瑞安县志》“赈恤”等。转引自，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年，第 10-11 页。

¹² ⑥参见：《止斋文集》卷四《桂阳军劝农文》，作者陈傅良南宋瑞安人。转引自，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17-23 页。

¹³ ⑦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主要包括短曲辕犁的应用和粪肥的使用，以及引进占城稻种植等。参见：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17-23 页。

由于清朝税赋政策的变动(隐口现象消除),尤其是高产作物的引进大大拓展了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温州地区与全国一样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膨胀,人口规模攀升至 37 万余户。清中后期之后温州可能与全国一样,遭遇了“人口危机”,即人口急剧增长与社会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导致“消灭人口”的社会危机现象(消极的人口抑制机制),也可以说是“马尔萨斯危机”。当然在没有更加严格的收入等数据的验证之前,这也只能算是尚待验证的假说,然而从目前的相关数据和佐证资料来看,基本可以判断在南宋温州初现人口的“马尔萨斯制约”现象。

二、温州历史上的人口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 南宋时温州人地关系紧张对“斯密式”发展的推动

在单部门马尔萨斯模型中,马尔萨斯“制约”的一个重要经济后果是生产资料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终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致使经济发展水平会在一个固定的均衡人均收入水平徘徊,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很难出现。那么,马尔萨斯“制约”的另外一重涵义:即对经济发展的抑制是否同样存在呢?

对照温州经济史,我们发现“马尔萨斯制约”初现的南宋时期,是温州经济发展史的一个巅峰。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后,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温州的货品可取运价低廉的沿海水道通达当时的都城杭州。外部巨大消费市场的拉动,推动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期。与此同时,南宋时期宋廷正式开辟温州港为对外贸易港口,约在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前后,为了管理和开展同海外诸国的贸易,还在此设立了市舶司,温州的海外贸易也大大拓展。

在农业上,如前所述,温州地区的人口压力推动了南宋时期温州水利设施的修建和耕作技术的改进,并进一步逼迫温州地区的农业结构向高产农作物和精细耕种发展。由于宋室南迁带来的巨大市场拉动,农业商品化率大大提高。温州的柑桔自北宋以来,就在中原颇受欢迎,被列为贡品,但因交通不便,距离消费市场太远,无法大批外运,因而栽培业没有获得更大发展。南宋时期,温州一跃成为两浙地区最大的柑桔栽培区,除柑橘业外,茶业也是民间的一个重要副业,柑桔业和茶叶的发展除了小部分满足自己需求外大部分是面向市场的一种商品性生产。“东瓯之俗,率趋渔盐”,由于消费市场的扩大,作为温州传统产业的渔业及其加工业也在南宋时期获得了大发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民间拥有的船只数量众多^{①4}。

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使得很多温州人无法在传统农业部门谋生,生存环境迫使温州人进一步突破“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农村中许多农民困于生计被迫走向经商之路,有的从事“贩私盐卖私茶”,有的成为“挑贩客家”,外出经商的农民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向农村的渗透。在农业与农村中出现了雇佣劳动^{②15}。为了谋生许多温州人学会了一些专门的手艺,由此涌现出一批能工巧匠,区域专业性人力资本的投资大力推动了温州地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南宋时期温州官私手工业门类齐全,生产专业化程度大为提高,并进一步在历史中形成了“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③16}。南宋时期温州手工业的发达表现在造船业、制盐业、漆器、造纸、丝织品、瓷器等的繁荣上。同期,温州还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户:机户(这是宋代纺织业中机织家庭的专称,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并出卖纺织品)。南宋陈谦成在《永宁编》道:“温居涂泥斥卤,土薄艰艺,民勤于力而以力胜,

¹⁴ ①从端平初开始,南宋政府征调温台民船数千只前往定海守隘,并分拨去淮东镇江戍守。宝裕五年,南宋政府特立“义船法”,规定三州所属各县每都岁征调船只数。当时的温州所属四县共管民船 5083 艘,其中面阔一丈以上的有 1099 艘。这些船只中应有大量从事捕鱼业的渔船。参见: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三《奉行周燮义船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补本人文资以任责》;宝庆《四明续志》卷六,《三郡隘船》。转引自: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28-29 页。

¹⁵ ②“民达善治生,尝为余言,少遭父丧,一日墉者数十辈立于门,请所使,又不能遣”。参见:(宋)薛季宣,《浪语集》卷四十八,《林民达墓志铭》。农村雇佣劳动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在农村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¹⁶ ③及至明清时期永嘉楠溪江一带还出现了某些专业的手艺村,有歌谣称“造船老司出渔田,北山村人精铸炉,茂竹山下出弹棉匠,烧瓦老司出敬仁,泥水老司出绿障”。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构成了温州地区专业性人力资源的优势使该区能够在自然资源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形成了一批富有区域特色的本土性支柱产业,为其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参见:胡念望,《楠溪江古村落文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 页。

故地不宜桑而织纴工，不宜粟麦而粳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①7}

商品流通由此大大活跃，一方面由于手工业生产和大量人口的生活需要，温州需从域外大量输入米、木材、铁和铁器、丝、漆以及其他一些生活用品；另一方面，温州区域的盐、茶、漆器、丝绸、木材、鱼类产品和果品、以及其他产品如蠲纸，大量输往以临安为主的东南地区。此外，温州还成为当时主要的中转贸易港口之一，与泉州之间贸易联系甚广，并与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频繁。“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入宋以后温州地区大量出现的逐末现象表明温州地区人口得以成功分流，除了部分农闲从事小贩的农民，许多温州人开始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是故明人感叹，温州人“往往能握微资以自营殖，岂所谓因地之利者乎。然物繁而用侈，俗亦少靡焉。”^{②18}

实际上，宋时的温州，人口压力以及适宜的外部市场条件的刺激，已经稳定地将温州的社会经济送入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轨道。从现在的眼光看，这就是以分工和市场扩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即斯密式发展。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展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把南宋时期温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黄金时期。无论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来看，宋代都是温州区域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后来体现出来的温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特点，可以说是在宋代全面形成的。历史研究中比较关注的宋时温州“永嘉学派”的出现和“南戏”的形成，主要都是从宋时温州商品经济的发达来解读的。可以推断，南宋时期的温州，“马尔萨斯制约”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另一重后果“马尔萨斯发展陷阱”并未出现。相反，可以说适度的人口压力、尤其是外部市场的刺激，推动了斯密式发展、即“斯密动力机制”的形成，使得经济开始脱离传统农业部门增长模式，开始了在另外一个轨道上的运行。正如，历史学家葛剑雄所指出的：“中国历来的人口稠密区一般都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相反，人口稀少地区倒基本上是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水平也不高”^{③19}。换句话说，南宋时期的温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发展机制。

2. 温州经济史上“斯密式增长”的延续

可见，适度的人口压力是推动社会经济偏离传统农业经济运行轨道、进入系统的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如前所述，西欧18世纪的“人口压力”并没有如马尔萨斯预言酿成“人口危机”，相反，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不同于过去历史长达几百年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显然，宋时的温州，人口压力以及适宜的外部市场条件的刺激，也已经稳定地将温州的社会经济送入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轨道。从现在的眼光看，这就是以分工和市场扩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即斯密式发展。从理论上来说，斯密动力机制一旦形成，就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自我累积和循环发展的内在发展路径。在此，主要围绕温州“斯密动力机制”延续与受制的状况，结合温州经济史进行探讨。

宋时至清初，由于“斯密动力机制”的形成、和相对稳定的人口状况，温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生活较为富足。虽历经朝代更替、以及倭患和“海禁”等重大事件，地方经济一定程度上经受破坏、重建、发展累积这样的过程，但是宋时“斯密动力机制”下形成的民间意识形态、社会与经济发展方式基本上得到延续；与此同时，虽然此间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累积与叠加效应，但是“斯密动力机制”本身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扩展，换句话说，受到了抑制。对以上判断或者假说，笔者举一些资料扼要论之：

元时由于京都再次远离，一定程度上温州又复归其“限山阻海”的劣势区位，限于当时的运输条件，可以推断温州的国内市场范围有较大程度缩减。与此同时，从海外贸易的拓展来看，随着更多沿海港口的兴起和竞争，温州港的腹地不断萎缩，限制了温州海上贸易地位的扩展^{④2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温州海外贸易的停滞，由于元朝廷延续了唐宋以来鼓励海外贸易发展的

¹⁷ ①参见：《永宁编》，南宋陈谦成于嘉定九年。转引自，转引自：俞光编，《温州文献丛书·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第2页

¹⁸ ②参见：王光蕴等，万历《温州府志》卷五《食货》。转引自：俞光编，《温州文献丛书·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第4页。

¹⁹ ③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余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6页。

²⁰ ④如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由于泉州港的兴起和军事方面的原因政府撤销了温州的市舶务，并入明州，其后元朝政府一度温州恢复了市舶司，后因江口淤塞、外国船往来减少，至元三十年（1293年）并温州市舶入庆元。

政策，如元朝廷曾多次下诏“勿拘海舶，听其自便”，对海外诸蕃也是“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②1}。所以当时沿海地区海外贸易普遍兴盛，这也包括了温州，实际上对于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民众来讲，海外贸易构成了生计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元朝，温州市场空间的拓展受到京城变更和外部竞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发展势头总体上受一定抑制，然而并无明显的中断。元时人称温州，“…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②2}，其社会风尚则为“…王谢之风流远矣。余韵所存，君子尚文，小人习于机巧妙丽…”^{②3}

对明时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一定的争议。有研究者称，到明代由于倭患和“海禁”政策造成的社会经济破坏^{②4}，以及严重人口负增长导致“人口压力”缓解，温州逐渐变成一个农业为主的区域(李文涛，2005)^{②5}。从“浙东俗敦朴，人性俭音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以及“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地，稻多寂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于台，闽福齿繁，常取于温，……”^{②6}这样的记载来看，明代温州人地关系确实松弛了，并由此导致了了明清之际持续三百多年的福建移民入温高潮。

然而，从明代市镇布局较之宋元时期更为密集这个事实来推断，明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较前仍有相当发展。明朝宣德(1426-1435)年间，黄淮称“国朝经理天下，分建布政司为十四道，而以浙江为雄藩。浙江统郡十有一，而浙左以温为上郡。”^{②7}明万历年间(1573-1620)，汤日昭写道，“瓯虽僻在一隅，实当东南要害。且也林木台粟鱼鳖之饶，牢盘之利，甲于他郡。其民无不衣被文绮，吹竿鼓瑟，六博蹴鞠，皆窳不事事而好游闲。”^{②8}历史上的这些文字记载虽然不能排除文学的夸张，但是在一定程度是反映了当时温州的社会风貌，可以提供一定的佐证。

不太拥挤的人口，富裕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应使明时温州维持相对富足的经济水平。然而，由于区位优势导致的国内市场缩减、以及海外市场拓展的系统性抑制，迫使温州社会经济系统只能在区域范围内进行“内源性”再生产，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②9}，使得温州历史上“斯密动力机制”的拓展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同时由于“人口

²¹ ①参见，《元史》卷一《世祖本纪七》，转引自：陈丽霞，《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99-100页。

²² ②黄缙著《永嘉重修海堤记》，作于元至顺三年。录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九《词翰一》。转引自，陈瑞赞编注，《温州文献丛书·东瓯逸事汇录》，第442页。转引自，陈瑞赞编注，《温州文献丛书·东瓯逸事汇录》，第2页。

²³ ③林泉生《思远楼记》，作于元末。载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九《词翰一·记》。转引自，陈瑞赞编注，《温州文献丛书·东瓯逸事汇录》，第2页。

²⁴ ④明朝鉴于“海疆不靖”的现实，推行“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只允许少量的“朝贡贸易”。这一政策的实施，严重危及了东南沿海包括温州居民的生计，许多人被迫挺而走险，违禁通商逐利。他们四散海上，“往往私下诸蕃贸易香货”，亦商亦盗，“商道不通……商则转而为寇，商道既通则寇转而为商”

²⁵ ⑤参见：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38页。

²⁶ ⑥参见：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浙江》。转引自：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38页。

²⁷ ⑦黄淮《介庵集》卷八《重建永嘉县治记》。该文写于明宣德三年。转引自，陈瑞赞编注，《温州文献丛书·东瓯逸事汇录》，第3页。

²⁸ ⑧汤日昭，《温州府志序》，万历。转引自，陈瑞赞编注，《温州文献丛书·东瓯逸事汇录》，第3页。

²⁹ ⑨清朝初期，中国对外贸易有过短暂的自由发展时期，但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为封锁拥护明室占据台湾的郑成功势力，清政府发布禁海令，并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下令将温州、台州、宁波三府沿海的居民“防海徙界”，使得许多沿海繁盛之地变为一派废墟。清廷甚至还规定“商船、渔船不许一艘下海”，这使得温州等沿海地区的鱼盐之利大失，私人的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严加防范。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年，清政府才正式解除“海禁”，允许浙江等沿海地方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开禁以后，敏感的温州商人不失时机，“踊跃争奋”，可去之处，无所不至，外贸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康熙二十七年，温州就有商船通航日本长琦，境内大宗木炭运销日本。但康熙五十六年年，清政府又颁禁海令，导致温州地区刚有所起色的商船业再度受创。

压力”——这一在斯密动力启动与形成期至关重要的内在推动力的衰减，带来一定的社会惰性，应该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当时温州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减弱。尤其明、清以降，温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在全国默默无闻，复归到了外界对其“辟远下州”^{③0}、“地僻俗美”^{③1}的评价。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经济史研究中，无论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史的学者、还是研究两浙地区经济史的学者都对温州不是十分的看重。

另一个比较显著的证据是：仅就城市规模而言，南宋时期的温州城池周长十八里，“较诸雄藩会府虽不及，视列城则过之”，当时的温州城在全国来说应该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城市。但到了明清时期，城市的周长还局限在十八里之内，而以前比温州城规模小得多的城市发展迅速超过了温州。另外，一些县的县治，比如乐清和瑞安，县城在元代被毁，明清时期虽然恢复，但规模和南宋时期差不多^{③2}。

三、温州经济史上人口变迁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启示

在经济史学家的眼光中，西方近现代经济史实证了“斯密式发展”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突破，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斯密动力机制”的扩展，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市场经济机制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照，近现代中国经济史关注的一个核心命题则是，即中国社会早熟的商品经济发展为什么没有造就近代中国的领先发展，相反近代中国的发展似乎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本文即是结合温州经济史的相关材料，通过对温州历史上人口变迁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探讨，对这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之谜作一个局部和片段式的粗略考察。

通过对现有温州现有经济史资料的观察，笔者认为：南宋时，温州适度的人口压力推动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分工与市场的交互式发展，即所谓斯密式发展；此后至清初，由于“斯密动力机制”的形成、和相对稳定的人口状况，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社会生活较为富足。中间虽历经朝代更替、以及倭患和“海禁”等重大事件，地方经济一定程度上经受破坏、重建、发展累积这样的过程，但是宋时“斯密动力机制”下形成的民间意识形态、社会与经济发展方式基本上得到延续。总体而言，宋以降元、明、清时期的温州还是基本延续了商品经济发展形态，分工的日趋细化、市镇网络节点的日趋密集——都表明了这种态势的延续。相对稳定的人口压力，也意味着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成为社会生计维系和经济发展的常态和要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温州依凭区域内和部分区域外市场形成的农业、渔业、手工业和商贸业的社会分工体系，维持着相对小康的局面。故清纳兰常安评价：“…温限山阻海，土地不宜粟、麦，而事鱼、盐，务桑、麻，织席贩木，得利颇饶，地称殷富焉。然其俗务外饰而好游观，宴会必丰腆，嫁女必盛装奩，优伶是尚，歌舞相矜…”^{③3}

然而，虽然宋以降直到明清，此间温州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累积与叠加效应，但是“斯密动力机制”本身却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扩展，换句话说，受到了抑制。如果按照黄宗智的观点，宋以降温州的经济发展似乎陷入了所谓“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内卷式发展”之中。然而，笔者认为若严格按其内在演进理路论之，元、明以及清初温州经济发展并非黄宗智意义上的“由于不断追加劳动投入带来边际效率递减从而侵蚀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个意义上的所谓“内卷式”发展。而是促进“斯密动力机制”持续演进的一些基本条件的缺失所致。这种缺失既包括来自历史的一些客观变动，如都城的重新变动、其他地方的竞争等客观因素，更是与当时朝廷对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尤其对外贸易和市场的重要性缺乏理解，从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与促进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国策，使得包括温州在内的沿海一带经济先发地区失去了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并进一步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至少，对于温州这个局部地区而言，如果在清末确实出现了“马尔萨斯陷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之前更长的历史阶段中其内生的“斯密动力机制”内在扩张冲动一再受抑制的客观历史后果。

³⁰ ①叶适：《水心集》卷二十九，（题二刘集后）。转引自：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38 页。

³¹ ②清赵钊《谭后录》卷下。转引自，陈瑞赞编注，《温州文献丛书·东瓯逸事汇录》第 29 页。

³² ③参见：李文涛，《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38 页。

³³ ④参见：清纳兰常安《受宜堂宦游笔记》卷二八，转引自：陈瑞赞编注，《温州文献丛书·东瓯逸事汇录》，第 28 页。

实际上，宋时温州“斯密动力机制”的形成也推动了温州区域社会与文化形态的系统转型，这种转型的结果实际上是使得温州形成了独特的区域群体心智模型和相应的成套社会支撑框架(相关术语见:诺斯 2005)，这是历史上温州的“斯密动力机制”虽然受限却持续稳定的内在原因。这些特点可以系统地在温州区域的社群信任结构及其支持系统(以民间信仰为支撑的社群教化)、分工与协作的习惯(历史上温州专业生产区域的形成，历史上温州人的结社传统)，不同于主流的区域文化意识形态等(包括传统中国少有的对专业技能的相对重视、部分文人的实用化导向，以及包括永嘉学派和晚清的“维新”知识群体的出现)。这是这种社会结构、习俗、文化的遗存，加之从清末、民国、至于新中国，温州地区受太平天国运动、抗日战争、乃至新中国之后国有经济等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干扰较少，温州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地方小传统，这种小传统在改革开放初被市场机遇所激活，从而开始了温州经济上的“斯密动力级之后”的复活与恢复性发展。

可以说，现在的温州模式只是历史上的温州“斯密动力机制”的当代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发展包含着独特的中国文化要素，是属于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内在自组织的市场经济之路。然而，温州“斯密动力机制”的进一步演进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支持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整合，但是这种整合同样也只能立足于鲜活的民间社会自组织和中国文化的内在属性之上。

参考文献:

1. 史晋川等.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2. 冯兴元. 市场化—地方模式的演进道路[J]. 中国农村观察, 2001(1).
3. 余辉. 温州模式的社会生产体系新解[J]. 温州论坛, 2003(3).
4. 陈安金、徐明君. 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10(4).
5. 陈瑞赞编注. 温州文献丛书?东瓯逸事汇录[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6. 胡念望. 楠溪江古村落文化[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年.
7. 俞光编. 温州文献丛书?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年.
8. 刘练军:《评价与反思:晚清温州唯心知识群体》, 载《二十一世纪》(香港), 2003(8).
9. 吴松弟. 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J]. 历史地理, 1990(7)..
10. 陈丽霞. 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D]. 浙江大学, 2005.
11. 李文涛. 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12. 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中译本)
13. 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4. 王家范. 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J]. 史林, 2004(4).

-
15. [美]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中华书局, 2000. (中译本)
 16. 陈建军. 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17. 韦森. 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no. 1).
 18. 吴乐旻. 我们真的理解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停滞吗?[内部讨论 ppt],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10.
 19. 道格拉斯·诺斯.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0.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M].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1. Young, Ally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The Economic Journal, 1928(38):527-542.